

中共與美國關係面面觀

尹慶耀

一

中共過去抨擊日本是軍國主義，把日本一些影片乃至三島由紀夫自殺事件，都拉來用作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罪證。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和日本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同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社論就以「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作為標題。此後，同樣的詞句屢見不鮮。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編輯埃爾·費爾（Earl W. Foell）詢問鄧小平對雷根（Ronald Reagan）當選美國總統有什麼看法。鄧小平首先表示祝賀，並且認為根據雷根先生過去的講話，在蘇聯全球戰略的觀點，雷根和中共有許多共同點。鄧小平還說美國副總統布希（George Bush）是他的老朋友^①。這和競選期間中共對雷根當時言論的抨擊，以及一九八〇年十月布希北平之行所遭受的冷遇，前後已大不相同。

這給我們一種啓示：對中共那些因人因地因時因事而異的言論，不能過分相信，最重要的是要用事實來印證。

部分美國人士研究美國和中共之間的關係，往往有兩種傾向：一是認為美國過去與中共隔絕是一種錯誤；二是認為中共和蘇聯的分歧，是美國政策導致的結果。前者失之過分自謙，後者失之過分自誇，二者間有些矛盾，且與事實有出入。過去的史實證明，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到一九七一年中共拋出「乒乓外交」，中國大陸的大門是中共自行關閉又自行開啓的，所謂隔絕，美國又何必自尸其咎？

就中共言，蘇聯由老大哥變成頭號敵人，二者由全面合作到兵戎相見，是由於中共企圖在共黨集團內向蘇共爭取平等地位，在全世界與蘇共分享共黨革命領導權，此外，還有其他的恩恩怨怨，那都不是受美國政策的影響。美國前任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在歐洲的一次講演中，曾對西方人士說，中共和蘇聯，「它們曾經爲了自己的理由而爭吵，它們也將爲了自己的理由而和解」^②。這是說，莫斯科和北平過去的翻臉和將來的握手，不會受局外人所左右。

註①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版。

1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國若干人士就有意拉攏中共。戰後中共深閉固拒，使美國無法接近，而中共一直以反美為國際統戰的旗號，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事件後，中共才宣布進入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同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共「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為華沙會談事發表談話，聲言中共一貫主張要美國同意「中—美兩國簽訂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⑥。那被認為是中共的一項積極表示。但由那時起到雙方發表「建交公報」，仍然經過了十年歲月。最後為什麼終於建交呢？又是何方主動呢？這是一個很難分辨的問題。

一九七八年是一個關鍵性的年度，同年四月美國已經決定要和中共「關係正常化」。五月下旬白宮安全事務助理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ezezinski) 訪平，公開支持中共反霸，而中共也自同年下半年起，將其對外活動重心由第三世界移至第一、第二世界，其主要原因乃是蘇聯擴張行動的加緊，使美國與中共漸處於不利地位所致。

七十年代美國、蘇聯和中共的三角鬭爭，本是尼克森 (Richard M. Nixon) 時代的「低盪」(detente) 政策所引起，當時華盛頓要在莫斯科與北平之間保持等距離，才能有所謂「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的局面出現。但尼克森於一九七四年水門事件 (Watergate case) 下台後，美國聲望大受損失。蘇聯乘虛而入，一九七五年四月支持北越攻陷西貢，接着擴張箭頭就指向安哥拉，一九七六年轉向非洲之角，一九七八年支持衣索匹亞擊潰索馬利亞協助的奧加登地區的游擊隊。一九七八年五月支持「剛果民族解放陣線」(FNLC) 從安哥拉入侵薩伊 (Zaire)。

在西南亞，一九七八年四月阿富汗政變，陶德 (Mohammad Daud) 總統兄弟遇害，由馬克思主義者塔拉基 (Noor Mohammad Taraki) 接長政權。這當然又是蘇聯的一項勝利。

最關重要的乃是中南半島的局勢。一九七五年中南半島赤化，河內即着手推行其「印支聯邦」計劃。一九七六年四月越南與赤柬衝突。同年十二月卅一日金邊與河內斷交。中共支持赤柬對抗越南，並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照會越南，要求後者關閉其在廣州、南寧、昆明的總領事館。同月廿九日蘇聯允許越南正式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 為第十個會員國。七月三日中共照會越南，停止對越南的經援並撤退專家。

註⑥ 臺北，英文「中國日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註⑧ 「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七日) 第五版。

根據上述事實，可以說一九七五年越南淪亡時，「低溫」卽已告終，蘇聯的擴張使美國感受威脅，要籌謀對策。就中共說，蘇聯的包圍圈越來越縮緊，使它急於要圖謀對蘇反包圍。於是，一九七八年五月布里辛斯基訪平，在大陸聲稱一個強大而安全的中共的存在，乃是美國的利益。中共也於同年下半年對美加緊勾搭。這也可稱爲事出有因。

美國和中共建交，似乎是華盛頓在主動。然而北平對此並不積極嗎？那可不見得。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布里辛斯基在「美中（共）經濟協會及美中（共）全國貿易委員會」的一次演講中說，美國無法讓對外伸出一隻手的中共又把這隻手縮回去。他拿這個理由來爲美國與中共建交作辯護。如果中共「伸手」屬實，它就不是完全被動。

三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也就是美國和中共發表建交公報前不久，香港「文匯報」在社論中透露，當時在短短十天之內，鄧小平三次談到中（共）美關係問題。一次是在東京談的，一次是返北平後談的，最後一次，是十一月六日在曼谷談的。三次都是答覆記者的提問。鄧小平在東京時說，中（共）美關係正常化，美國必須履行與中華民國斷交、撤軍、廢約三條件；他在北平說，中（共）美關係正常化，決不能草率從事；他在曼谷說，中（共）美關係正常化，可採日本模式解決^④。這顯示中共也急需拉攏美國。

中共對美關係正常化有三項條件，但美國也有三點立場。那就是：（一）繼續對臺灣出售武器；（二）美國就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發表公開聲明，中共不得予以牴觸；（三）北平須同意美國在臺保有某種形式的非官方代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九日鄧小平在北平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他首先表示訪問日本是他多年以來的願望，另一願望就是訪問華盛頓，現在所以不能去，是因爲有中華民國的大使館在。他表示如果中（共）美關係正常化完成，他就不妨去見馬克思了。不過，由於國內問題，他還願再多活二十年，他希望能看見「四個現代化」進行到某種程度。他認爲關係正常化問題要靠卡特（Jimmy E. Carter）總統下決斷。鄧小平說，他自己過去說過，中（共）日條約可在一秒鐘內完成；現在，中（共）美關係正常化就算加倍，也可在兩秒鐘內完成。如果（把臺灣問題）作政治解決那就很容易^⑤。

鄧小平這些話，用意很明顯，他表示急欲對美「正常化」，希望美國早日與中華民國斷交。同時暗示臺灣問題可以作爲政治

註④ 「悄悄地傳話，公開的答覆」，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社論。

註⑤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五面。

問題解決，並以「四化」從經濟貿易方面誘引美國。同年十二月十二日鄧小平接見美國駐北平聯絡辦事處主任伍考克（Leonard Woodcock），認知關於美國出售武器給臺灣一事，雙方「意見不合」。但私下保證，對於卡特總統發表他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之關切，不發表「抵觸」的聲明^⑥。

由右述事實的進展過程中，會使我們產生另一個有意義的疑問：美國和中共究竟何方最需要「正常化」？

四

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布里辛斯基訪平後，「中共牌」這個名詞就在美國流行起來。不過，最初踏進中共大門的季辛吉博士認為，美國不應該在策略上利用中共，他說：「中（共）蘇爭執，有其本身的用意及邏輯，它沒有必要獲得美國的贊助」^⑦。其實，美國若干人士都不承認在玩「中國牌」或是聯中共制蘇聯的說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雙方發表的「建交公報」中，有「反霸權」的字樣，也有任何一方都「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的文字。認真說來，這和中（共）日和約中的「反霸」條款與「第三國」條款同時並存一樣，有些掩耳盜鈴的味道。美國和中共接近，不是爲了蘇聯？蘇聯本身又有如何感受與反應？

對美國與中共接近頗具影響的「美國對中共政策計劃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我們可以利用中共對美蘇聯合對付它的恐懼；或者在適當時間，設法來減輕中共的憂慮；如果中共和美國的來往有若干進展的話。中共也看到（當然不是很樂觀的）利用美國對付蘇聯的可能。美國自然也可以利用改善對中共的關係，來限制若干蘇聯困擾我們的趨勢」^⑧。這裏顯然有玩牌和聯、制的意味。至於中共是否恐懼美蘇聯合對付它呢？應該說也是有的。

中共過去常說美蘇企圖合作主宰世界。一九六五年九月廿九日陳毅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聲言：如果美帝國主義決心要把戰爭強加給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讓印度反動派、英帝國主義者、日本軍國主義者也跟他們一起來吧，讓現代修正主義者也在北面配合他們吧^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在中共「九大」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仍然是將美帝、蘇修並列。一九七一年七

註⑥ 參閱卡諾（Stanley Karnow）作「美國怎樣進行與中共正常化」？原刊《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一九七八年（美國與世界）特刊。

註⑦ 《美聯社》柏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四日）第一版。

註⑧ 莫斯汀（R. Moonstein）、艾布維茨（M. Abramovitz）合著《美國對中共政策計劃書》，原名（*Remaking China Policy*），轉引自郭榮趙節譯本臺北，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一一頁。

註⑨ 《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十月七日）第二版。

月季辛吉訪平之後，中共已決定歡迎尼克森往訪。同年十二月周恩來在中共黨內作關於國際形勢的告報，指稱「美、蘇是我們的主要敵人」，「在現階段，要充分利用美蘇矛盾，擴大其矛盾」^⑩。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平之後，周恩來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又在黨內作關於國際局勢的講話，他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不要兩面作戰，要一面作戰好」。他說，「我們不提『聯美反蘇』，雖然在有些事情上我和美有共同點。」他又說：「我們反兩霸，是一個口號。實質主要是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這個最現實的敵人，主要是打擊這個社會帝國主義，對這個問題，我們很清楚，美國也很清楚」^⑪。從這些文件中，我們可以體會得出，美國和中共在互相利用。如果美國認為，「我們不會讓中共決定美國對蘇聯的政策，也不會讓蘇聯來決定美國對中共的政策」^⑫，那麼就必須同時假定，中共也不會讓某一方決定它對另一方的政策。

五

在對付蘇聯這個問題上，美國和中共有若干共同點，但也有不少差異。例如，美國最願見的是中共和蘇聯長期維持緊張而致爆發戰爭的關係。華盛頓極怕莫斯科和北平又言歸於好，但也就心它們衝突擴大，以致破壞和平與權力均衡。據傳一九六九年蘇聯準備對中共發動核子突襲，美國就曾加以阻止。但不戰不和的緊張局面，能够長期維持，也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該還記得，中共過去一直在強調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林彪的「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到毛澤東指出：「關於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⑬。這些話的真正意義是，帝國主義在大戰中兩敗俱傷，人民就乘機革命奪取政權，那所謂「人民」，是受共黨領導的或者就是共黨自己。毛澤東的公式，是抄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蘇共政權、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共產集團的故智。中共並不想捲入大戰，一九七五年五月喬冠華引述毛澤東的話說：「曹仁力戰東吳，孔明巧取荆襄，以逸待勞，立於泰山觀虎鬪」。在同一講話中，喬冠華稱頌了毛澤東關於戰爭的論斷。喬又說，「今美蘇在全球爭霸，勢必導致一次世界大戰的重新爆發」^⑭。如果細細體味那些話的真正含義，那麼說中共有意挑撥美蘇衝突，該是不會錯的，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進攻越南，就可能含有拉美蘇下水的用意。

註⑩ 《匪情月報》第十九卷第六期（臺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二—九三頁。

註⑪ 同註⑩，九五—九六頁。

註⑫ 《美國對中共政策計劃書》，六二頁。

註⑬ 《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四月廿八日）第四版。

最近，中共對於一些理論與口號有了些微的修正。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姬鵬飛認為中共所提：「目前的形勢是天下大亂，越亂越好」這個口號，造成外人不好的印象。對外工作應該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⑭。中共「副總參謀長」劉華清認為對新的世界大戰的說法，應該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由於反戰勢力的軟弱，可能發生，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努力建設，儘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只要全世界反戰的力量大過於任何好戰的侵略集團勢力時，大戰就可以制止或推遲」^⑮。中共現今大多講「推遲」戰爭，拉攏美、日、西歐組成反霸（反蘇）統一戰線，來共同對付蘇聯。當然這只是說法的改變。

如果說彼此都反蘇，就有平行的或共同的戰略意義，那是有些勉強的。世界上反蘇的國家很多，但反的程度與方式未必相同。美國希望中共和蘇聯不戰不和，而本身並不拒絕與蘇聯緩和緊張，雷根政府對蘇的強硬立場，肇因於蘇聯的擴張行動，華盛頓決不是一個好戰的政府。中共呢？它只企盼美蘇不和，暗中未必希望它們不戰。而它自己真的願意和蘇聯長久緊張下去嗎？這也不無疑問。

六

中共過去堅持「中蘇之間的原則鬭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但是，這不應該妨礙中蘇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⑯。這項立場的實質意義是：黨和黨沒有關係，國和國可改善關係；意識形態要繼續對立，實際利益可以調整。

過去（一九六九年十月），毛澤東說過，中共和蘇聯的公開論戰（即指原則鬭爭）要繼續一萬年^⑰。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國全國蘇聯文學研究會」在哈爾濱召開「全國第二次現代蘇聯文學討論會」，會中多數人主張將蘇聯的內政與外交分開，說蘇

註⑭ 一九七五年五月廿日喬冠華在天津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禮堂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及中共對外政策的講話。見《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九七八年四月）三九九頁。

註⑮ 一九七九年六月姬鵬飛在中共「外交部長」黃華主持的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

註⑯ 劉華清對內講話。

註⑰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即中共和蘇聯開始北平邊界談判前夕，中共政權所發表的「聲明」，《人民日報》（同月八日）第一版。

註⑱ 史諾（Edger Snow）著陳雲翻譯《漫長的革命》第廿四章「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六月）一八七頁。

聯對外推行霸權主義，在內政方面仍然是社會主義^①。這不是一次地方性事件。同年十一月「紐約時報」揭載巴特斐（Fox Butterfield）的一篇特稿，透露中共當局向其幹部們傳閱一份內部重要文件，它是總結中共「社會科學院」智囊團的總辯論，提供鄧小平參考的。這文件指稱蘇聯的主要生產工具仍掌握在國家手中，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修正主義。文件說，目前來自蘇聯的主要威脅，是它軍事上的擴張主義^②。

蘇聯方面也注意到這一點，一九八一年初，蘇聯科學院所屬遠東研究所的古杜希尼科夫（L. M. Gudoshnikov）博士，曾在莫斯科對日本「共同社」一個訪問組說，中共雖然在向右傾，但並未失去社會主義的基礎。關於鄧小平和陳雲的對蘇態度，古杜希尼科夫認為，他們把官方發言和非官方發言加以分別，在官方場合，盡量避免反蘇言論。古杜希尼科夫指出，在中共內部，「蘇聯修正主義」的詞句已經消失，在官方場合，所謂「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一詞也不大使用了^③。

在目前，中共確已把蘇聯的內政外交分別對待，對內替它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所謂原則性鬭爭就沖淡了；對外強調蘇聯的霸權主義，那就便於拉攏其他國家和中共組織反霸統一戰線。這種轉變讓我們體認到儘管像中共那樣重視意識形態，但替蘇聯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並不困難。現今，中蘇共間依然沒有黨與黨的關係，可是原則鬭爭絕不再需要一萬年。至於國與國的關係，本來就是容易改善的，如果條件合適的話。必須指出，這種轉變並不表示毛澤東和他的繼承者之間的差異。儘管中共現領導階層在批毛、貶毛，但對外仍然執行毛的政策路線。而且，對蘇聯由恩成仇，對美國由敵而「友」，不都是毛澤東手上轉變的事實嗎？誰能擔保中共將來不會再轉變？

從蘇聯一方面看，它認為毛思想就是反蘇，必欲粉碎之。不過，如果中共不再用毛澤東的觀點去看世界，莫斯科並不拒絕和中共言好。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三日在蘇共廿六大總結報告的對外政策，仍然把中共列入對社會主義國家關係那一部分，那是說仍然承認中共是社會主義國家。布里茲涅夫說，中共內部正經歷著變化的過程，其真實意義還須待時間證明，那將表示中共的領導者拋棄毛澤東的遺產到如何的程度。他說，遺憾的是北平在對外政策方面還談不上任何好轉。這項政策是在加劇國際情勢，與帝國主義勾結，這當然不會讓中共回到健全發展的道路上去。布里茲涅夫指稱，帝國主義者不會成爲社會主義的朋友。美國、日本及一些北約成員國同意和中共擴大軍事政治關係，只是想利用中共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敵意，謀取自己的帝國主義利益。

註① 日本〔產經新聞〕夕刊（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一日）第一面；日本〔朝日新聞〕（同年四月一日）第七面。

註② 〔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三頁。

註③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第七面。

回顧一下過去的事實，一九七九年四月黃華通知蘇聯，俟雙方「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一九八〇年四月）後不再延長，但同時就建議同蘇聯舉行談判，解決懸案、改善關係。同年十二月蘇聯進軍阿富汗，一九八〇年一月中共將上項談判的第二輪（應在北平舉行）無限期延期，但雙方的「國境河流航行聯合委員會」第廿二次例會，仍於同年二月五日至三月十九日在黑龍江省黑河鎮舉行，討論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等國境河流上存在的航行和航道業務問題，達成了部分協議。一九八一年二月廿六日至三月九日雙方又舉行上述委員會的第廿三次例會，根據一九五一年協定，調整了有關特定措施並簽訂了議定書。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不曾杯葛蘇聯今（一九八一）年的建軍節活動，迄今它仍在購買蘇聯的某些機器特別是與能源有關的設備以及交通工具。

共黨在鬭爭中都是「兩手政策」，它們沒有「是即是」、「是非非是」那樣的邏輯觀念。它們的「轉變」主要是由於「內因」而非由於「外因」。這裏我們要指出的是，周恩來曾經指摘：林彪說中美會談是出賣原則、出賣革命、出賣越南，這是狂言妄談，是對黨的污蔑^②。這些話是值得懷疑的。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閉幕前一日，鄧小平曾召集在北平的各省、市、自治區區黨委負責人舉行座談會，華國鋒也參加。鄧小平談到他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江西勞動改造之前去見毛澤東，毛說他亂幹，缺少階級鬭爭觀念。當時他很不服氣，回答說不如跟着林彪實踐，學會據無功爲有功，學會懷疑一切，打擊一切才不是亂幹，才是階級鬭爭觀念強。毛澤東語含禪機，笑笑說：「歷史會判斷林彪正確與否，你不要不服氣」。鄧小平說，想想毛澤東的確是有天才的預見，還讓林彪唯妙唯肖地表演下來，古往今來，誰能有這種膽識^③。如此看來，毛澤東整肅林彪早有預謀，說林彪反對與美國接近，和說他是墜機而亡同樣不可靠。

中共內部鬥爭，大部分都與權力和經濟路線有關，在對外政策上，歧見是比較少的。

七

提到路線鬥爭，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時同各地負責幹部談話紀要中，就列舉了十次，其中第七次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鬭爭，第八次同彭德懷、黃克誠反黨集團的鬭爭，第九次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鬥爭，第十次同林彪反革命武裝政變集團的鬥爭，都是中共政權成立以後的事^④。毛死後「四人幫」事件爆發，中共把它列爲第十一次

註② 《匪情月報》第十九卷第六期九二頁。

註③ 中共內部文件。

註④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中發第十二號文件，《中共機密文件彙編》，三一三七頁。

路線鬥爭。如果目前鄧小平及其反對者之間又發展成爲一次路線鬥爭，那就整整十二次，在中共政權成立前後各六次。本來，內部鬥爭在共黨說來是極普通而且極普遍的事，不過，中共的權力鬥爭更假階級鬥爭的名義進行，文革期間且有兩個階級的司令部對峙，其深度與廣度就遠非其他國家共黨可比，而其後遺症也難於短期間加以收拾。

在華國鋒與鄧小平的權力鬥爭中，目前鄧小平已暫佔優勢，但絕非已穩操勝算。葉劍英的抵制，各大軍區的態度，中下階層幹部的抗拒，文革期間入黨的大約一、八〇〇萬黨員中「極左」思想的流毒，都是鄧小平的隱憂。自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執行的就是鄧小平路線。可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標準尺遇到阻礙，貶毛不能澈底，審判林、江集團不如預想的順利也沒收到預期的效果，而思想混亂却逐漸瀰漫。開民主窗出了毛病，只好又行收緊；物質刺激、經濟改革發生了流弊，不得不又放緩脚步。幹部任期制、年齡限制，會導致領導階層分裂，安定團結遙不可期，而鄧小平的形象正逐漸醜化。爲此，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七日「紐約時報」刊出了中共「人民日報」國外版編輯袁湘魯（音）的一篇投書，引起一陣關於「保鄧」的討論，有人主張要美國協助保持鄧小平在中共內部的安定地位，認爲他是可以和西方接近的「實用主義者」；有人主張不要激怒中共，以免破壞美國和中共之間建立未久的關係。當然，這些人士的着眼點，還是希望不妨礙美國和中共共同制俄。

前面說過，中共內部已有過十一次路線鬥爭。在最初毛澤東與中共內部的國際派鬥爭時，蘇聯是插過手的，但以史達林那樣被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公開決議奉爲「世界革命最高領袖」的身分，他並未能在中共內部鬥爭中「保」得住誰；蘇聯過去對中共的「革命」與「建設」，給予如許鉅大的援助，也未能阻止中共向之以背。如果美國認爲自己既可插手中共的內部鬥爭，又可以左右中共的對外路線，那未免自視過高，與現實脫節。

不管鄧小平是不是實用主義者，他的成敗決定在大陸內部而不決定在大陸以外。惟其他是實用主義者，如果他不敢垮台，他將來對外決策，將唯中共之利是圖，而不會爲什麼情感、願望或幻想所累，否則他就不是實用主義者了。

八

最難令人折服的說法是，拉攏中共有助於亞洲和平。如果蘇聯鎮壓過東柏林暴動和匈牙利革命，干涉過捷克自由化運動，用兵阿富汗並威脅波蘭，可以作爲它危害和平的證據；那麼中共參加過韓戰，介入過越戰，挑起過金馬砲戰，和印度發生過邊界衝突，和美國建交後還進攻過赤色越南，迄今仍聲言保留第二次教訓越南的權力，難道這些可成爲它維護和平的象徵？依照蘇聯「

消息報」(Investiya)的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發生了三〇次軍事衝突，其中一九次是由於中共的過失而發生。該報沒有進一步說明這些衝突的詳細經過，我們無法作進一步推斷。不過，我們可以肯定，中共不會停止它對印度那加族(Nagas)叛亂的支持，對於不支援亞洲國家內部共黨活動及不在臺灣使用武力，都不肯作出確切的保證。而自中共踏入「國際社會」後，亞洲乃至整個世界局勢日增危機，中共對緩和緊張局勢毫無貢獻。

儘管大家都不承認玩「中共牌」，但主張拉攏中共的不見得真熱愛中共，其動機仍以玩牌為主。我們認為，中共這張牌是政治牌而不是軍事牌。誠如「美國評論」雜誌所說，中共在東方牽制了約四十五師蘇聯軍隊，使他們不至於部署在西方，但那幾個師並不是因為美國做了什麼或不做什麼才部署在中蘇邊界，他們也不可能因為美國的任何行動而撤離^②。我們似乎可以補充說，那些蘇聯軍隊現在中蘇邊境上是真的，但那並未妨礙蘇聯對西歐、日本增高威脅，也不會妨礙蘇軍進攻阿富汗、威脅波蘭或以代理戰爭向亞、非、拉丁美洲擴張勢力。中共自己沒有力量與蘇聯對抗，甚至沒有足夠的實力能支持它在對蘇談判中爭取比較平等的可以接受的條件以緩和緊張。任何國家都無力援助中共到足以與蘇聯對抗的程度，最大可能僅足援助它增加一些對蘇談判的資本。

另一方面，誠如季辛吉所言，中共確是蘇聯的「痛覺」，但他認為利用中共以困擾蘇聯，作為對蘇聯最近行爲的一種懲罰的想法是危險的，因為莫斯科對此可能不會出之以理智的反應^③。這些話是對的，認為為中共解除國際孤立，中共會變得理智些；和認為拉著中共去嚇嚇蘇聯，蘇聯會理智些。這些想法，本身就是非理智的。事實是，自從一九七一年美國打開中共的門戶時起，蘇聯的軍事力量以及它在全球戰略方面的軍事部署加強了；它對中共的包圍圈縮小了；它與第三世界國家新簽了十項「友好合作條約」，在各地佈置了條約網。當蘇聯和索馬利亞還是盟友的時候，布里茲涅夫曾經告訴索總統伯爾(Abderrahman Janna Barre)說：「我們的目标是，侵佔西方所依賴的兩大寶藏庫——波斯灣的能源寶藏庫，和南非洲的礦物寶藏庫」^④。現今蘇聯不是正在朝向此一目標前進嗎？聯中共制蘇聯的政策，不是減緩了蘇聯的這一步驟，而是加速了它的這一過程。

自己手無縛雞之力而去激怒一條北極熊，是不應該的。中共牌就可能有這種作用。日本與中共的「和約」，美國和中共建交的影響，不在自己如何解釋，而在蘇聯如何認知，蘇聯認為它們在搞三角軍事同盟。大家都說要避免刺激蘇聯，問題是蘇聯如何感受，它不僅受到刺激，而且感到憤怒。其反應已見諸行動。美國說不出售武器給中共，但據傳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卡特總統會要

註② G. Mosyko 作「北京·與帝國主義結成集團」，[消息報]（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

註③ 諾曼·波德霍瑞茲作「未來的險境」，原載「美國評論」雜誌，見臺北，「聯合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第二版報導。

註④ 季辛吉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的談話。臺北，「聯合報」（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二日）第四版。

註⑤ 轉自尼克森著祝基堯摘譯「真實的戰爭」，臺北，「新生報」（一九八〇年九月廿一日）第三版。

求國防部提出美國可能售予或提供中共致命武器與裝備的清單，一旦蘇聯對波蘭使用武力時，這些武器和裝備將售予或提供中共^⑳。這裏的疑問將是：售予或提供中共致命的武器與裝備，如何能確定中共一定會使用而且一定會只對蘇聯使用這些武器與裝備？中共一方面強調反霸，一方面聲言要爭取二十年的和平時間來完成「四化」。鄧小平和埃爾·費爾談話時說，蘇聯全球戰略、社會帝國主義政策如能改變，現在就可以改善中蘇關係，爲什麼要等到若干年以後呢？他要求蘇聯把中蘇邊界的蘇聯部隊起碼減少到黑魯曉夫時代那樣^㉑。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蔣元椿在「人民日報」發表「論蘇聯的東亞戰略」一文，強調蘇聯的威脅，但同時又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並不對蘇聯形成威脅」^㉒。一九八一年四月四日「美聯社」北平電報導，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共官員表示，中共會說，如果蘇聯不將中蘇邊界的一百萬蘇聯部隊大部分撤出，「中」蘇關係無法改善。他要求蘇聯把中蘇邊界上的四十師蘇軍減至十個師^㉓。

要求蘇聯改變它的戰略、放棄霸權主義是太難了（不過，中共降低這些要求，比它替蘇聯摘掉修正主義帽子並不難），這是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不容易改變的一面。然而，從上引中共自己的文章與談話中，我們看不出中共有同蘇聯一戰的決心與準備。那麼，把致命的武器與裝備售予或提供給中共，其後果豈不值得顧慮。

九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共會不會玩牌？

前引「美聯社」北平電透露，中共堅決表示，它絕不打「俄國牌」，也不站在蘇聯一邊^㉔。論時間，那是美國前總統福特（Gerald R. Ford）携帶雷根函件訪問北平之後，那些話是有所爲而發的。在福特北平之行以前，中共的「半月談」雜誌指摘所謂「反華暗流」有下述三個論點：認爲中共很弱、很窮，裝備落後，在全球戰略中無足輕重，不值得重視；說現在中共有求於美國

註⑳ 美聯社（華盛頓（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九日）電，臺北，〔聯合報〕（同月卅一日）第六版。

註㉑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版。

註㉒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第七版。

註㉓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第一版。

註㉔ 同註㉓。

，而美國無求於中共；認為只要美國政府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像臺灣這樣的問題，中共是可以吞下去的。「半月談」的文章，指這些論點「荒唐可笑」，逐一加以「批駁」^{②4}，其詞鋒是十分犀利的。

福特離平後的前引「美聯社」電文中，中共官員就說，中共同蘇聯之間有著根本的原則分歧，是不能隨便放棄自己所堅持的原則的。他說，中共對美國沒有「俄國牌」可玩。並且表示，中共「從長遠和全球觀點出發，希望改善同美國的關係」^{②5}。

中共官員所說，正是玩牌的話。如前所述，中共已替蘇聯摘掉修正主義帽子，原則分歧已經模糊。從長遠觀點看，美國和中共沒有共同點。而很多美國人士，都認為中共只能扮演地區性角色，它沒有資格談全球戰略。中共官員的話，是爲了某種特定目標而講的。在談話中他又提出美國出售防衛武器給中華民國的事，那就和「半月談」文章相同，有些恫嚇和要挾的味道。中共可以對蘇聯玩美國牌，也可以對美國玩蘇聯牌。如果美國爲了保鄧或防止中共和蘇聯緩和緊張關係而在各方面支援中共，到頭來中共將永無止境的對美勒索，稍不如意就作出要與蘇聯和解的姿態，美國爲了怕前功盡棄而繼續投下賭注，那可真是危險萬分了！一九六八年後半和一九七八年後半，都是中共有求於美國，可惜華盛頓過於急躁，反而顯得美國有求於中共，而在此後的實際交往中失去了主動。中共在對美關係中，仍然適用它那套「又聯合、又鬥爭」的原則。它也慣於以低姿態達成高目標。然而，時間愈久，中共和美國的關係中困難也愈多，那也是必然的。

回憶中共的四個現代化提出之初，對自由世界確實具有某種程度的誘惑力。支持日本與中共簽訂「和約」、支持美國與中共建交的人士中，不能說都與此項誘惑無關。尤其是日本，它對中國大陸市場抱有極大希望，甚至就心那裏會成爲「日美戰爭（指商戰）」的舞台^{②6}。如今中共現代化已經失敗，對外大量毀約，使外商蒙受重大損失。中共在日本發動「雪中送炭」運動，我們暫且不預言其結果如何。但美國商人却已對中共徹底失望，不少商家又轉向中華民國。中共封閉北平美國圖書館後^{②7}，主張藉文化交流影響中共內部的人士也會感到失望。一臨到在軍事上聯中共制蘇聯的關頭，又發現中共軍力是如此脆弱而落後。前引「半月談」所指摘「批駁」的論點，其實都正確無誤。中共無力甚至無意作美國反蘇鬥爭中的助手，却要阻撓美國國內法——臺灣關係法的執行，那簡直是干涉內政，爲美國絕大多數人所不能接受。

註②4 參閱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三日）第二版。

註②5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第一版。

註②6 參閱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第五面「記者之目」欄。

註②7 中央社《洛杉磯》（一九八一年三月廿六日）電，《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透露，美國駐北平大使館圖書館已經關閉。臺北，《中央日報》（同月廿九日）第二版。

把意義模稜的詞句寫進某種文件，而後喋喋不休，強迫對方「認同」自己的解釋，也是中共慣用的手段。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和周恩來發表的「上海公報」中，中共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省」。「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但美國的聲明是：「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這表示美國對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主張一個中國雖不持異議，但反對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這意義並不模稜。可是，日後中共有意把「上海公報」照它前述單方面的聲明作解釋，而且根據「上海公報」否定一切不符合它的意圖的美國措施。再則，中共一貫的作風是強求人家支持它自己，甚至要求人家與自己完全一致，而罔顧人家也有其自己的立場。正是爲了不願跟隨中共反蘇，河內已與北平反目成仇。我們很難想像華盛頓會時常屈從中共的意見。中共內乾而外強的作風，定然會在對美關係中製造不少難題。

十

美國和中共是當彼此都在弱與困的時點上接合的，動機在彼此利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美國正困於越戰，實力與地位都較前低落，它希望同蘇聯緩和緊張，拉中共制衡蘇聯並影響北越達成停戰，和自由盟邦分擔世界防衛責任。那正是尼克森主義（Nixon-doctrine）產生的背景。在中共方面，文革時期內部鬥得精疲力竭，國際間陷於絕對孤立，而蘇聯大軍壓境、衝突迭起，於是毛澤東不得不「轉身」，和美國勾手。

水門事件（Watergate case）後，美國內部分裂，卡特政權又缺少果斷，蘇聯乃乘機大肆擴張。中共雖曾提出「三個世界」理論，以第三世界爲反霸統一戰線的主力，但蘇聯的擴張正是指向第三世界，中共在那裏的影響力着着後退，而中國大陸周圍的蘇聯包圍圈正步步縮緊，中共只好把對外活動重心轉移至第一世界（中的美國）和第二世界，對日「和約」、對美建交，就是這種情勢促成的。

如今，蘇聯政策不會改變，不過它內部的經濟困難，阿富汗、波蘭問題，使它有不少困擾。最重要的是雷根政府的堅定立場，使蘇聯不得不轉趨謹慎。這幾年，它的擴張太快了些，已引起自由世界的警惕。它對中共的包圍網，也已近於完成。依共黨慣性推測，蘇聯可能改採和平攻勢，爭取時間，鞏固它已有的擴張成果，鬆弛西方的戒備心理，伺機再另圖前進。

現今美國已從越戰的創傷中恢復，蘇聯的行動刺激它不能不作出反應。人民支持增強國防力量，而雷根總統的反共立場與果斷能力，也非其前任所能比擬。這不是在引起戰爭，而正是走向和平的必要步驟。當美國本身足夠強壯，蘇聯不敢輕舉妄動時，

「中共牌」的身價就貶低了。

中共和西方尤其是美、日接近的最大本錢，一是反蘇，二是現代化。現代化垮下來以後，反蘇也就缺少了支柱。中共的作風，有著虛誇與蠻橫兩大特色。目前，虛誇已經不靈了。要求聯合救濟大陸災荒，那和當年拒絕外國救援唐山震災的態度是如何不同啊！在美國發動「保鄧運動」，在日本發動「雪中送炭」運動，都象徵著中共確已到了窮途末路。這個政權在對付蘇聯的牌局中究竟能够發生多大作用，會越來越令人懷疑。但它要人家這樣作，不要人家那樣作的蠻橫作風，一時很難改正，時間一久，中共對美、日、其他國家的關係將漸趨冷淡。說真的，環顧世界，有那個國家能長期作中共的朋友？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本彙編爲20開本，全一冊，約五十餘萬字，內容分七大類，包括文件七十六件，屬限閱資料，憑機關公函購用。

英文版每冊 新台幣八〇〇元
美 金二十二元五角
郵資另加：(平郵掛號) 國內 新臺幣十二元
外 美 金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輯印